



# 卢沟桥事变 80 周年 “如何跨越战争”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高莹莹

2017年7月1日,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日本华人教授会议联合主办,日本公益财团法人东华教育文化交流财团、《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协办的卢沟桥事变80周年“如何跨越战争”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东京明治学院大学举行。本次研讨会主题为“如何跨越战争留下的障碍——来自历史研究前沿的信息”,来自中日两国的21位学者发表了研究成果。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和横滨国立大学名誉教授村田忠禧做了主题发言。王建朗阐述的是战后对日处置的构想与实践的变化,他通过对基本方针的确立、领土处置构想的变化、中国驻日占领军计划的夭折、美苏斗争中的中国立场四个方面的梳理,认为二战的战后对日处置基本上是成功的,但由于中国缺少有效的参与、美国过于强势等原因,使一些战后处置背离了当初的设想,成为今日国际纠纷的根源。

村田忠禧对近年中日两国出现的一些观点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他强调应该尊重史实、两国学者共享史料,要推动钓鱼岛问题的实证研究,有针对性地批驳日本政府的错误认识及论调。

与会学者讨论的主题分为三个部分:1. 历史叙述中的战争及其扩大的过程,强调对历史事实的勾勒;2. 抗战的中国和日本,强调侵略与被侵略者在战争中的不同立场;3. 对于历史认识问题和中日关系的建议,讨论战争爆发的原因、战时战后的历史连续性、战争的历史记忆遗产、目前中日关系面临的课题,及今后的展望。

—

第一部分讨论“历史叙述中的战争及其扩大的过程”内容丰富多彩。在讨论中日战争扩大化的问题上,日本的三位学者都是从对华认识方面阐释的。骏河台大学井上久士列举了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存在的几个代表性的对华认识和调查,分析了它们与事实之间的偏差,从对华认知方面分析了日本必败的原因。大东文化大学田中宽分析的是战时日本文学中体现的民众对中国以及战争的认识。千叶商科大学赵军以中西功为对象,分析了其战时、战后的思考变化。

中国的三位学者都比较注意对外文资料的利用。南开大学贺江枫利用中日两国的史料,详尽还原了日本对阎锡山的劝降工作以及阎锡山的应对,显示出随着战事的推移,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对地方军阀态度的影响。杭州师范大学的周东华利用中日两国的一手档案,考证了沦陷时期杭州日华佛教协会在战争状态下配合日军侵略对当地百姓开展宣抚工作的情况。山东师范大学的刘本



森梳理了英美学界对卢沟桥事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为当下七七事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提供了线索。

## 二

“抗战的中国和日本”是此次会议讨论的第二部分内容。

丽泽大学的樱井良树是日本政治史专家,此次会议上,他对自己近年对日本华北驻屯军的研究进行了介绍。他以时间为序,通过对史料的详细解读,对华北日本驻屯军的来历、性质变化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北京大学的赵秀宁对青岛沦陷时期日本强制实施的“献铜”运动作了介绍。

静岡大学的户部健探讨了历史上南开大学与YMCA之间的关系,并将之作为1937年7月日军轰炸南开大学的远因进行了分析。

北京大学李玉蓉讨论的是八路军的军事财政问题。这一问题目前相关研究并不多见,作者以太行革命根据地研究对象,探讨抗战初期八路军在军费、粮草筹措中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及其解决途径,考察了八路军根据军事战斗与根据地建设需要,从无到有创建自己的财政制度的过程。

整风运动作为根据地研究的重要内容,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但对于整风运动中各个根据地的审干问题,因缺乏资料等鲜少有学者关注。南开大学的程斯宇利用一些个人回忆录、山西省档案馆档案等资料梳理了华北抗日根据地整风审干运动开展的全过程。他认为整风运动在中央的督促下,从“学习”转向“审干”,并随着斗争形势日益紧张,发展为一场旨在锄奸反特的“抢救运动”,“逼、供、信”及群众大会等错误审干方式给华北各地党组织及干部造成巨大冲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高莹莹对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台湾著名的原住民抗日运动雾社起义进行了探讨。她认为仅从日本官方提供的单一史料去推动事件发生的原因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将雾社起义作为日本在台湾推行理蕃政策的一个后果,还原并思考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的真相,如此才能避免后人在书写历史记忆方面出现史实上的谬误。

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关智英讨论了日军的对吴佩孚“工作”,他从聚集在吴佩孚身边的人的背景、他们对沦陷区的设想两方面,认为吴佩孚“工作”不仅涉及其出马问题,还涉及中国政治体制是否发生变化的问题。日军在扩大对华战争的过程中,起初只关心占领是否顺利,而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内容并不感兴趣。关智英使用了大量的日文文献,对于史实的重构提供了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面向。

## 三

会议第三部分围绕“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展开讨论。中日战争爆发,或者说中国政府决定抗战的原因,自战争爆发以来就有日本一些人强调是因为中国受到了苏联的诱导,这一说法演变为“共产国际阴谋论”,在日本大有市场。有鉴于此,大东文化大学鹿锡俊利用蒋介石日记、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张嘉璈日记等,梳理了西安事变以后、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蒋介石等中国领导人对中日苏关系的认识。他认为西安事变以后,苏联的确是希望中国抗日的,而蒋介石等人对此非常了解,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并不像今日有人主张的蒋介石等人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这一问题。在讨论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时,尽管需要关注第三方的外界因素,但中国对日认识的主体性尤其不容忽视,“共产国际阴谋论”是子虚乌有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高士华介绍了中国大陆的总体战研究状况,并对中日两国的研究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认为“虽然中国的研究者比较注意对美国、德国总体战的研究,但最注意的还是日本的总体战,或者是中日总体战,中国的学者一般认为,中国也进行了总体战,但这是被动的总体战,和日本有计划、有准备的总体战完全不同”。中国的总体战研究受到了日本比较大的影响,但主要表现在日本史研究方面,抗日战争的总体战研究还是很不够的,对外国研究的借鉴也需要进一步努力。

天津商业大学的杨东对“抗日战争”概念的表述与逻辑进行了梳理。他认为中共在战争期间随着战事的推移,有意识地从理论高度对“抗日战争”的概念进行了阐释,其内涵不仅包括民主、农民战争、革命,还包括其行动意蕴的另一个表达:“团结”。

早稻田大学的天儿慧在报告中强调今后青少年在中日关系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思考中日关系时应更多地展望未来。

中央大学的姬田光义讲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日本战犯的改造,认为中国通过对日本战犯的人道主义改造,使其超越了自身的屈辱与痛苦,体现了中国人在克服历史苦难方面的智慧与精神,值得作为世界遗产而保留。

此次会议受到日本学界及相关人士的关注,会议气氛热烈,共有80多人出席。有日本学者指出改善中日关系,重在行动,中日关系的未来在青年人身上,希望通过广泛的民间行动,改善中日关系。在闭幕式上,王建朗强调历史认识问题困扰中日两国甚久,日本正确地认识历史、理性地看待历史,是发展中日两国关系的重要条件,期待日本历史学界做出更大的努力,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在日本举办关于抗日战争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在2017年举办的系列活动之一,不管是弄清这场战争的真相,还是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都需要外力对日本社会进行推动,而与日本历史学界进行平等的交流对话是推动的好方法,故而《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近年也一直努力协助开展这项活动。从这次讨论会来看,效果良好,达到了交流的效果,同时也通过日本学者向日本社会做了呼吁,督促日本社会弄清历史真相,彻底反省过去的侵略。

这次参会的10位中国来的学者中有8位是青年学者,把中国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到海外,不仅可以加强中外之间的学术交流,同时也可以帮助拓展他们的学术视野,为抗日战争研究培养更高水平的人才。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以后会继续推动这类学术活动的广泛进行。

〔作者高莹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

(责任编辑:高士华)